

世界建筑史教学中的“关系”再现方法转向

A Relational Shift in the Teaching World Architectural History

王洁琼 | WANG Jieqiong 胡恒 | HU Heng

中图分类号: TU-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740 (2024) 06-0103-09

DOI: 10.12285/jzs.20231229001

摘要: 本文以“再现”问题的视角切入, 探讨世界建筑史教学中阐释历史建筑影响建成环境演变的视角和方法转向。随着更新的媒介工具与“再现”的方式和目的不断交融, 建筑史的书写范式也发生改变: 建筑史已不再是作为一种可凭经验验证的过去“真实情况”的记录, 而是作为一种对当今关切的问题和未来的可能结果之间的过渡。与此同时, 建筑史教学正通过反思“再现”方式和目的的变化而革新: 作为建筑史教学中的“再现”媒介, 从图像到时空情境, 其不仅是作为对历史参考的描述或抽象概念的表达, 而且是用于认知、质询甚至重建尚未被发现的复杂或模糊关系。本文通过梳理建筑史教学中对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和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建筑史教学实例的观察以及对课程讲师的深入访谈, 从教学法、内容组织以及课程作业设置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揭示当代世界建筑史教学中对建成环境的生产方式、社会过程及其创造历史等拓展关系的强调及其相应的再现和阐释方式的转变。认识这些转变将对于我们重新思考建筑史的学科边界以及重新建构世界建筑史教学的框架具有参考意义。

关键词: 建筑史教学、再现、图像、关系建构、现当代建筑史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aradigm shift in teaching world architectural history by focusing on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of representation. That is how historical precedent continues to shape the form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With the changing means and purposes of “representation,” the architectural history writing and teaching paradigms have transformed: writing or teaching architectural history no longer means merely presenting an empirically verifiable record of the past “the way it really was,” but rather mediating present-day concerns and producing possible futures. The role of images and environments as representational mediums in architectural history teaching has also gained a new positioning. Images and environments engaged in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are not only descriptions or representations of reality but also tools for recognition, reconstruction, and rediscovery of relations-architecture’s complex and ambiguous relationships to the world. It draws on teaching examples from the UCL Bartlett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to outline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is teaching approach, including the framing of theoretical references, the cultivation of relational and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effective working disciplines.

Keywords: Architectural history teaching, Representation, Image, Relational reconstruction, Modern history

作者:

王洁琼,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研究员;
胡恒 (通讯作者),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江苏省“卓越博士后”计划 (2022ZB40) 资助。

录用日期: 2024-07

建筑史是关于阅读或参考过去, 还是正展现在我们所经历的环境变化中, 甚至以多种方式 (无意识地) 控制我们未来的选择? 21 世纪以来, 建筑与技术、艺术和城市的关系经历巨变, 也正在挑战建筑史的学科边界: 从巨大的封闭园区到

跨国基础设施的建造规模变化, 从政府当局到各类社会机构的用户类型变化, 从拒绝历史参考到引进新的材料形式的变化, 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世界建筑史教学的目的和内容。如果建筑史不再只是记录一种可凭经验验证的过去“真实情况”, 而

是作为一种对当今关切的问题和未来的可能结果之间的过渡,那么建筑史教学的性质和意义亦有了新的探索价值[“再现”问题自18世纪马克-安托万·洛吉耶(Marc-Antoine Laugier)^①系统提出以来,便成为萦绕于现代建筑史中的争议话题。在《论建筑》(*An Essay on Architecture*)的著作中提出一个有关“再现”的理论框架。他认为18世纪之前的建筑设计实际上是,先对自然的模仿,而后对历史原型的转化:自希腊神庙以来的所有建筑都是对希腊神庙的再现,而希腊神庙则是运用石料对原始木屋(The Primitive Hut)(真正的自然原创)的再现,变化的仅仅是从一种物质形态到另一种而已]。在现代先锋派以及后现代建筑理论家们对“再现”问题的反复讨论和反思中,世界建筑史教学方法得以成型,并且呈现出批判性的继承。此刻,对世界复杂系统的认知又一次让“再现”问题甚至建筑学学科陷入危机。因此,以“再现”视角切入,重新关注世界范围内建筑史教学的组织、方法、参考框架以及课程作业设置等,在建筑学科整体面临转型的当下是刻不容缓的。

一、现代运动中的建筑史教学

一直以来,建筑史的学科使命与其在学术机构中的处境密切相关。现代运动之后的20世纪60年代至今,西方的建筑史研究在经历现代运动过程中被放弃、从艺术史脱离逐渐回归建筑学院,转而又重新进入了一个尴尬的处境,那就是建筑史与建筑设计以及更加广泛的文化研究领域的关系和界限依旧模糊。1999—2003年,《建筑史学家学报》(*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JSAH)曾连续三年刊登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建筑史教学的历史和现状,包括美国、英国及其殖民地、欧洲及其影响地区、拉丁美洲、亚洲和北非的部分国家。^②以MIT的建筑史教授斯坦福·安德森(Stanford Anderson)的一系列追问为始:“建筑史与建筑生产或教育相关吗?或者两者都不是?建筑史是

一门自主学科吗?还是作为‘服务’?如果是前者,那它的价值是否是为建筑学如何在社会立足提供批判性见解?如果是后者,那它是提供可用形式的宝库,一系列可供转换的形式范式,为建筑假设的滋生提供试验场,还是……”^③这批文章从学术机构设置、学科交叉、外来(殖民)影响和本土化过程等多个维度呈现了世纪之交世界范围内建筑史教学的发展状况和困境。欧美国家之间一直以来的建筑文化交流和现代运动的深度影响形成了更加明确的学术话语转向和发展时间线;而拉美和亚非地区则呈现出被一些教学模式(如巴黎美术学院体系, *Ecole des Beaux-Arts*, 以下简称“布扎”)主导而又挣扎于本土化的困境。

自18世纪至20世纪的大半段,以“布扎”系统为代表的学院派古典主义教学法曾主导欧美众多地区的建筑教学。建筑史教学的任务被限定为替设计寻找重要的历史模型和参考来源。建筑史未能成为独立的课程,而是与建筑设计教学紧密相连,作为设计教学附属,嵌入在以模仿传统为基础的绘图训练中,并且往往由建筑师担任建筑史教学。^[1]虽然英国的建筑教育在19世纪初就已认识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难以与北欧的土地、气候和风俗的适配,因而试图将本土中世纪建筑作为新的自由的建筑以及英式小屋设计的根基;然而直到20世纪初,对古典主义的模仿依然是英国建筑教育中的主流。^[2]法国更是到了1968年学生革命后才真正改革“布扎”教学体系。建筑史教学得以成为独立课程在综合大学的艺术史系和建筑学院两个平行的体系中发展。然而,两国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融入整个艺术史的学习,后者侧重于与建筑设计结合。^[3]美国的第一所建筑学院成立于1865年,受到“布扎”教学法的影响,没有成立独立的建筑史学科,而是嵌入在对历史中的重要建筑的临摹,掌握比例感、构图技巧、绘图技法等训练中;随后在美国成立的众多建筑学院普遍采用该模式。^④

“布扎”体系不仅垄断欧美众多地区,

同时也影响着拉丁美洲和亚洲。拉丁美洲地区有影响力的建筑师普遍受到“布扎”教学法的训练,并将其教学理念和方法带回本国,形成由建筑师担任建筑史课程教学,强调历史建筑分析和类型学训练的教学法。^[4]与之相似,我国建筑教育由20世纪20年代留学归国的建筑师(梁思成、杨廷宝、童寯等)创立,并引进“布扎”教学法;之后“布扎”教学法在中国占绝对的主导地位,直至90年代,新一批的回国的建筑学者才带回更加多样的建筑教育法。^[5]在“布扎”教学法对历史模仿和绘图训练的强调中,建筑历史上成为设计的参考工具。虽然“布扎”教学法式微,但是其留下的影响深远——即便是奠定现代主义建筑教育的大师们,也多受到过“布扎”教学法的训练。

20世纪30—50年代,受西方现代运动的影响,建筑教育呈现出对传统基于“模仿”和“操作”的建筑史教学的拒绝,转向能提供“科学”抽象概念参考的艺术史,以取代提供传统的古典主义风格参考的建筑史。以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聘请年轻的艺术史学家威廉·尼迈耶(Wilhelm Niemeyer)在杜塞尔多夫工艺美术学院(*Kunstgewerbeschule*)担任建筑史教学为起点,建筑设计开始从历史风格的束缚中解脱出来。^[1]曾在贝伦斯工作室训练的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和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将抽象概念引进当时美国新兴的建筑学院,从而确定了20世纪现代主义运动中建筑教育“反历史”的基调。在随后的二三十年中,这种对历史的拒绝态度将建筑史研究和教学排挤出了建筑学院,建筑史一度被寄养在艺术史专业,但地位远不如其他的视觉艺术史。

然而,建筑史学家尼尔·莱文(Neil Levine)教授认为现代建筑是连续的历史进化结果,其自身的历史应该被重新认识和书写。他指出:尽管现代运动中的建筑设计拒绝历史参考,但是“再现”实践并没有缺席;区别在于,历史模型不再来源于对真实存在的模仿,而是作为想象

的来源和参考。^[6]概念图或者拼贴画也许是现代运动时期建筑设计更加青睐的表现工具,也并没有完全脱离历史模型。^[5]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在类型的抽象化方面受立体主义(尤其是毕加索的绘画)的影响,他的绘图摒弃了对历史风格的想象,直接回到自然元素,通过重新组合设计元素来“再现”建筑与自然景观之间的理想关系。如果说赖特的绘图仍指向他的建筑,那么密斯的拼贴绘图已走向没有主体的再现(homeless representation),其所再现的并非“他物”(自然或历史),而是“自身”,即内在组织和结构的理想化——即使是采用早已存在的图像来进行拼贴,他所表达的意义也与那些图像无直接关联,而是另一个虚构的世界。^[6]因此,现代主义时期的建筑教育虽然表面上减少并否认建筑史教育,但事实上却是通过解构而重组了历史元素,进而虚构了一个逼真的建筑历史。

无论是现代运动之前指向客观的自然存在或是历史原型的再现,还是现代运动时期指向自身的结构逻辑或是理想情境的再现,建筑史教学无法回避图像媒介的再现与真实关系的问题。而对建筑史学科的处境和使命的叩问以及学科交叉所带来的认知模型转变,正在地影响着建筑史中的图像媒介与建筑、空间及其更广泛的再现对象的关系解读。

二、作为社会和历史过程中的物质性生产活动的建成环境的认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代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的建筑师-历史理论家们将挽救现代建筑的矛盾性、重振建筑史学作为自身的使命。这个时期,西方现代运动以来建立的新建筑原则面临着困境:如果现代建筑也变成了历史建筑的一种,那么继续践行现代主义的设计原则是否意味着掉入其所反抗的历史主义的逻辑?克里斯蒂安·诺伯格-舒尔茨(Cristian Norbrg-Schulz, 1926—2000)是该时期登场的建筑师-历史理论家之一。在西格弗

里德·吉迪恩(Sigfried Giedion, 1888—1968)创造的历史教学法——“相似法”(Methodengleiche)——的基础上,诺伯格-舒尔茨发展了通过将不同时期建筑图像并置比较,揭示视觉和拓扑关系作为建筑形式的来源,并称之为拓扑历史学(Topological Historiography)。^{[7][8]}在随后的《场所精神》(*Genius Loci Towards a Phenomenology of Architecture*, 1980年)中,他采用对比不同类型建筑的图像(包括照片和图示),例如将波西米亚岩石露头 and 曲线山墙的比较,以寻找相似的视觉逻辑,显示共同的场所精神(图1)。^[9]或许,对诺伯格-舒尔茨而言,引入拓扑学(几何特性)来作为建筑和建筑史的基础和来源,可以把建筑设计从复制过去的形式中解放出来,同时把建筑史从基于风格的分析类型中解放出来,以此挽救现代建筑的矛盾性并重新建构基于视觉统一性和完整性的建筑史学。在拓扑历史学中,拓扑形是建筑形式的来源,而图像再现比语言描述是更加接近“真实”的拓扑关系。因此,在内容呈现和页面组织中,吉迪恩和诺伯格-舒尔茨都强调了图像呈现在建筑史书写中的重要作用——图像不只是对文本的补充说明,而是建构了文本所无法提供的解释力。

诺伯格-舒尔茨的场所精神和拓扑分析可能对后现代运动以来的设计工作坊教学影响甚大,但在史学领域并未被完全接受。^[11]虽然诺伯格-舒尔茨试图以图像叙述改变(甚至替代)以文字为主的历史写作范式,但正如哥伦比亚大学历史保护专业教授豪尔赫·奥特罗-帕洛斯(Jorge Otero-Pailos)所指出的:诺伯格-舒尔茨对视觉的强调并通过抓拍原始的场所精神的瞬间来展现他所谓的非历史的建筑真实性,其实是对历史进程的隐藏;因此,他的历史理论恰恰是去历史化的。^[10]事实上,诺伯格-舒尔茨基于现象学的历史学方法帮助历史学研究拓展了第一手资料的范畴,即把主观材料(包括史学家个人的空间感受)纳入史学资料的考虑。但是,对拓扑历史学的批判也正是因为他将史学家

的主观观点作为权威或者真实的来源,而忽略史学家作为照片生产者者在特定条件下的意图。

对于将建筑史定位成服务于设计教学的建筑学院而言,拓扑历史学依然提供了建筑史教学改革的重要参考。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巴特莱特建筑学院对建筑史教学的定位很明确,即服务于建筑设计和生产。当代建筑历史学家和理论家的阿德里安·福蒂(Adrian Forty)作为巴特莱特建筑学院的建筑史教授,开创了将认知地图、图像叙事和社会过程进行叠加的教学法:在教学内容上,放弃宏大的时间线叙事结构(断代史),而以历史学背景的教授们的自身研究领域为专题;在课程组织方面,放弃西方普遍采用的“讲座(lecture)+讨论课(discussion)”的历史理论课组织方式,而采用“讲座(lecture)+步行研讨(walking seminar)”的组织。

不同于拓扑历史学对历史进程的隐藏,巴特莱特的建筑史教学对建成环境的再现通常作为社会过程和历史过程中的物质性生产活动。这与负责建筑史教学的历史学家们自身研究对再现技术发展的持续关注 and 警惕相关。阿德里安·福蒂对课程教学法的改革首先来自他自身的历史研究。20世纪90年代,反思当时学界将绘图作为建筑的主要传达媒介的趋势,他以著作《词语与建筑物:现代建筑的语汇》(*Words and Buildings: A Vocabulary of Modern Architecture*, 2000年)提醒建筑学者们话语生产对于建筑思维的传达的重要性。^[12]2000年以后,他的研究回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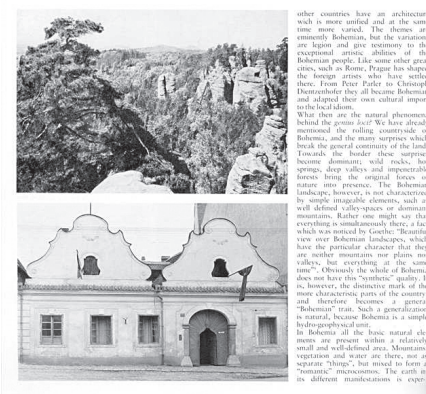


图1: 诺伯格-舒尔茨的拓扑历史学比较法

是启发学生批判性地分析解读图像生产者和叙述者对历史的“创造”能力。

如果说讲座是通过图像与话语的结合帮助学生理解建成环境的再生产和意义建构过程,步行研讨强调了学生认知空间的物质性在社会和历史进程中的生产和转化方式,可认为是时空叠加的情境再现。同样,布兰斯科姆在教学模块中,通过在伦敦及其周边寻找与“城市中的自我封闭的空间”相关场地并且按时间顺序向前推进串联起来,以此激发学生对“大英帝国”概念的批判性思考(图6)。步行研讨从19世纪初建于伦敦城区边缘的摄政公园(Regents Park, 1812—1828年)开始,感知其私人封闭属性和白天向公众开放的社会意义;到达20世纪初建的汉普斯特德花园郊区(Hampstead Garden Suburb, 1906年)后,学生将思考复制一个中世纪的贫富混住的理想城市给穷人使用的成败因素;进而到二战后建设的具有完整社区服务(包括商店、体育场馆和养老院)的住宅塔楼特雷利克大楼(Trellick Tower, 1968—1970年),学生将这个二级保护建筑与同时期建造的格伦菲尔住宅楼(Grenfell Tower, 1974年建成,2017年被火烧毁而被重新包裹)对比;最后步行到富人区诺丁山及旁边穷人的住宅区,学生在行走的环境中感受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在这种教学法中,通过带领学生在这些私人属性但公共使用的场所的四处走动中思考:同一个城市,相似的建成环境,如何在不同的历史和社会语境中帮助大英帝国实现特权,获得排除他人的自我封闭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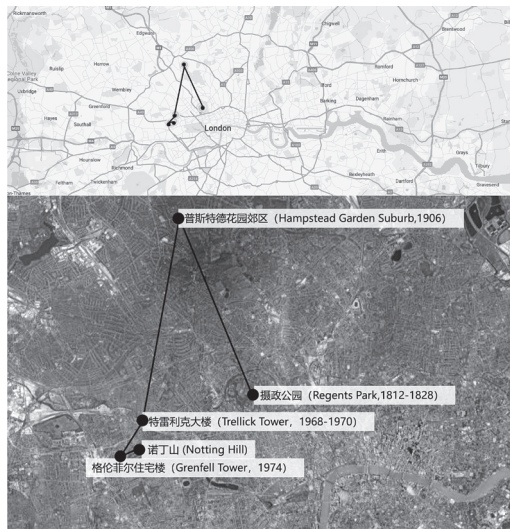


图6: 伊娃·布兰斯科姆教授所带领的徒步模块路线图

如果说,舒尔茨的视觉拓扑关系是一种确定不变的内在联系,那么巴特莱特学院的历史教学是从确定的拓扑形转向不稳定的建筑物质性关系。以历史研究为基础且融合物质性体验和社会性批判视角的教学法,在建筑史和艺术史之间寻求了一种平衡:将基于身体的物质性体验与基于图像的批判性叙事叠加,以达到帮助学生认知物质空间关系的社会维度。

三、作为塑造复杂政治经济关系的建成环境的意义质询

如果说英国的巴特莱特建筑学院的建筑史教学代表了一种建筑史服务于建筑设计和生产的教学模式,那么美国众多高校的建筑史教学则更多地体现出了挣扎:试图与建筑设计(工作坊)教育分离而成为一门更加独立的学科。1964年,大学建筑学院联盟的克兰布鲁克研讨会(Cranbrook Seminar of the Association of Collegiate Schools of Architecture)以“建筑历史、理论和批评”(The History, Theory, and Criticism of Architecture)为题,汇集了包括雷纳·班纳姆(Renyer Banham)、彼得·柯林斯(Peter Collins)、科林·罗(Colin Rowe)等一批建筑理论家,反思战后建筑学的新的学科使命。随后,以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为代表的后现代历史理论家们,通过反思对象征性的文化符号在历史建筑以及复杂城市环境中的媒介作用,而将美国日常城市景观中平凡(丑陋)建筑视作传达大众城市文化的有效符号。^{⑧[15][16]}文丘里的平凡历史学从城市公民文化的角度出发,提出图像标识和文化符号是比现代主义的纯粹的建筑空间形式更加接近“真实”情况下复杂、矛盾且不确定的城市环境和文化,从而为建筑学提供在自然、历史以及内在结构之外的参考和意义。

随后的20世纪70—80年代,这批建筑历史理论家们一方面试图将建筑史与(转向现象学的)设计工作坊教学法区分,但另一方面又拒绝传统的艺术史的方法论而去寻找新的方法论,包括重新书写现代时期先锋派的历史、论述后现代时期先锋派的本体论,以及引入文化领域的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历史学等。^[11]虽然1980年代以来的美国高校建筑史(包括理论)研究和教学逐渐从艺术史项目脱离而回归建筑学院,但是建

筑史所关注的问题却越来越远离建筑实践本身困境的体现。正如 MIT 建筑历史教授 (Mark Jarzombek) 所观察: 后现代知识分子正在将历史和理论带离他们原本想改革的对象——建筑实践, 这反而导致建筑实践不再受到自我反思的约束而彻底变成了一种职业实践。^{⑨[11]}

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建筑史研究和教学正面临着这样的处境: 建筑史教授虽具有建筑学学士或硕士学位, 但其博士研究大多在人文研究领域, 且教学和研究活动往往与人文领域的关系更密切。受到当下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以及新物质主义等新的哲学认知模型和方法论的影响, 无政治性的日常城市文化景观成为批判对象。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建筑史教授安德鲁·赫舍尔 (Andrew Herscher) 教授对文丘里的平凡历史学提出批判, 认为这些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学已不能够解释当下城市建成环境的政治复杂性: “建筑学通过‘向拉斯维加斯学习’等项目介入日常城市景观, 并以城市景观这种形式进行新的投资。这些建筑学的介入和投资实则默许了这些城市景观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特性, 这使得这些特性免受建筑批评或谈判的影响。”^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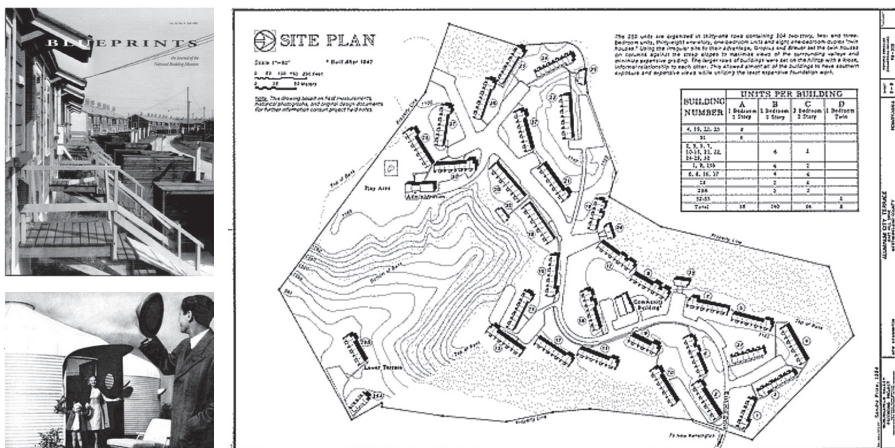
质询建筑在历史进程中的政治性参与是密西根大学建筑史教学的切入点。一方面, 密西根大学的建筑史教学与巴特莱特学院相似, 强调抛去对过去的客观“真实性”或者“真理” (truth) 的追求, 而是帮助学生理解过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另一方面, 建筑史教学的定位不再是服务建筑设计和实践, 而是扩展的建筑历史叙述建构的一部分。建筑史课程从组织框架到内容选取都体现出对主流时间线组织框架的抵抗尝试。课程组织采用典型的“讲座 + 讨论课”的方式, 即每周一次讲座, 随后建筑历史与理论方向的博士生们主要引导每周讲座结束后的讨论课。在内容框架中, 虽然隐含时间线, 但主要以主题或者类型进行安排。克莱尔·齐默尔曼 (Claire Zimmerman) 教授将本科一年级第一学期的《建筑历史 I》课程分

为“再现” (Representations)、“建筑和环境技术” (Technologies of Architecture and Environment)、“资本主义和帝国时代的政治” (Politics in the Age of Capitalism and Empire) 三个模块, 每个板块内部按时间线和地理跨度安排。安德鲁·赫舍尔 (Andrew Herscher) 教授则将《建筑历史 II》(以文艺复兴之后为主) 按主题分成劳工 (Labor)、社会差异 (Social Difference)、公众 (Publics)、城市性 (Urbanity)、产业 (Property) 五个部分, 每个主题内部按时间线和社会运动类型来组织内容 (包括世界主义、民族主义、地域主义、新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现代主义、城市主义、殖民主义、东方主义等思潮的影响)。

建筑史讲座中的图像和话语多指向建成环境的物质性生产和意义再生产的过程。图像呈现的是建筑物质性的实现方式、空间生产者的意图以及媒介传播方式, 其来源包含设计师的图纸、分析图示、推广的建造手册和说明书、建成环境照片, 新闻报道照片, 以及宣传广告页等。讲座中的话语也非中立, 而是来自作者的论点或者教授自己的质询。这些图像和话语的再现目的是意义重建, 突出建成环境生产过程中的斗争性和偶然性, 将原本被忽视的参与者带入历史之中, 进而对建成环境辅助塑造特定时期的政治关系进行质询。在《建筑历史 II》的“房地产和美国摩天大楼” (Real Estate and the American Skyscraper) 一讲中, 赫舍尔教授使用的封面照片是特朗普位于曼哈顿的办公桌; 其中, 办公桌左手边的雷姆·库哈斯主编的 *S, M, L, XL* (1995 年) 被圈出, 与其桌面的高楼渲染图形成呼应。^⑪ 讲座内容则以库哈斯的《疯狂的纽约: 一个曼哈顿的追溯宣言》 (*Delirious New York: A Retroactive Manifesto for Manhattan*, 1994 年) 为主线, 将美国摩天大楼这一建筑原型背后所涉及的建筑想象、资本、性别、政治的关系重新勾勒和解读。^[17] 也许材料科学和技术进步是建筑史教学解释摩天大楼这一建筑类型更为常见的角度, 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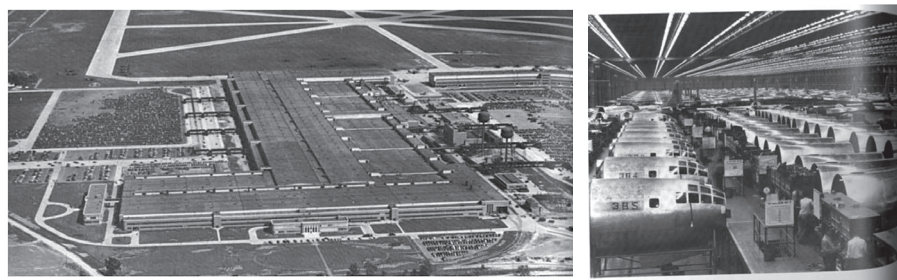
赫舍尔所谓的对当代城市建成环境的复杂性的解释则是通过揭示政治经济关系与建筑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实现这种历史研究和教学法既将建成环境解释为历史变化的发生地, 也将其作为历史变化发生的方式。

另一种质询教学法是通过并置或者叠合那些视觉上无关却与那个时空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有关的建筑图像和文字 (区别于吉迪恩的“相似法”), 以提问的方式揭示那些原本被认为中立的建成环境与历史进程中的政治形态的关系。在“拆迁: 全面战争的建筑” (Unhousing: The Architecture of Total War) 一讲中, 赫舍尔教授质询了三种建筑类型——住房、工厂和轰炸测试场地——与战争武器生产及其暴力结果之间的相关性。其中一张幻灯片并置了 3 个住房生产相关图像, 包括美国密歇根州伊普斯兰提郡 (Ypsilanti) 的柳树村工人住房项目 (Willow Village Housing Project, 1943 年) 的建造手册、沃尔特·格罗皮乌斯 (Walter Gropius) 和马塞尔·布劳尔 (Marcel Breuer) 在宾夕法尼亚州新肯辛顿郡的铝城工人阶级住房 (Aluminum City, 1940s) 的规划总图以及理查德·巴克明斯特·富勒 (Richard Buckminster Fuller) 设计的可移动的戴玛西翁之家 (Dymaxion House, 1945 年) 的宣传照。对二战期间的几个住宅项目的并置带出这一质询: 这个住房是为生产战争物资的工厂的工人准备的, 那么这个住房和那些工厂制造的武器所产生的暴力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图 7)? 另一张幻灯片并置了工厂的设计和建造技术突破与大规模的武器生产——由底特律建筑师阿尔伯特·康 (Albert Kahn)^⑫ 在伊普斯兰提郡设计的柳树运行轰炸机工厂 (Willow Run Bomber Plant, 1943 年) 和建筑内部成排的轰炸机照片。同样是二战期间的工厂设计, 带出这一关联性问题: 这类建筑与这些工厂制造的武器所产生的暴力有什么关系 (图 8)? 最后两张幻灯片将炸弹试验场 (bomb-testing site) 中的完整建筑与废墟场景关联——由安东尼·雷蒙德



This housing was intended for workers in factories producing war material, so what w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s housing and the violence that was produced by the weapons built in those factories?

图 7: 住房建筑与战争



Albert Kahn, Willow Run Bomber Plant, Ypsilanti, MI 1943

What was the relation of this architecture to the violence that was produced by the weapons built in these factories?

图 8: 工厂建筑与战争



Antonin Raymond, "Japanese Village," and Erich Mendelsohn, "German Village," Dugway Proving Grounds, UT, 1944

图 9: 杜格威试验场中的建筑

(Antonin Raymond) 设计的“日本村庄”和埃里希·门德尔松 (Erich Mendelsohn) 设计的“德国村庄”成为美国犹他州的杜格威试验场 (Dugway Proving Grounds, 1944 年), 专门为战争而建, 答案似乎就在问题中: 炸弹试验场的建筑与发生在这些地点的、由炸弹所产生的暴力有什么关系 (图 9、图 10)?

如果建筑物、城市空间、图片、绘图、文字等媒介所传达的本身就是“想

象”投射, 即通过重组一系列表现元素从而呈现“类真实”的想象, 那么将对看似无关的建筑图像资料进行并置、叠加、排列组合等操作, 也许是某一种更接近真实的呈现。面临着建筑物、城市空间、图片、绘图、文字等的“简化危机” (the crisis of reduction), 对那些被历史遗忘、忽略、压制或隐藏的政治文化空间的再现正在成为建筑史研究和教学的新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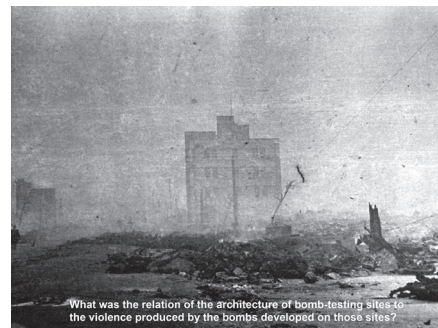


图 10: 战争废墟中的建筑

四、“关系”转向下的我国世界建筑史教学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巴特莱特建筑学院和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建筑史教学代表了目前世界建筑史教学组织中两种典型的范式: 服务于建筑设计的建筑史教学和面向人文反思的建筑史教学。而且, 两种建筑史教学方法都呈现出对更广泛“关系”的关注, 从画面中隐藏的建筑相关物及其复杂关系到画面之外的不确定性关系, 包括社会关系、政治关系、贸易关系、时间关系等。然而, 西方的建筑史学一直在讨论的图像、建筑与再现问题, 从自然、历史、内部结构、地方性或者大众文化中寻找参考的历程, 在中国的建筑语境中似乎失效了。而且, 自现代运动以来, 西方学术界所讨论的建筑史与艺术史的纠葛在中国的现代建筑教育语境中似乎也不存在。即便如此, 这两种建筑史教学方法的成型过程及其“关系”转向对理解当前我国建筑史教学的使命和变革方向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

我国的建筑史教学通常的内容组织以断代史为前提, 辅以分类解析。对于世界建筑史教学而言, 断代史的组织方式要么往往难以摆脱以西方为主的内容安排, 要么内容过于庞杂, 失去重点。以专题或者建筑类型为主, 辅以时间线的内容组织在世界建筑史的教学越来越普遍。这种内容组织方式有两个好处: 首先, 每次讲座的主题突出, 可以摆脱风格进化史而回到建筑的发展本质规律, 并且案例选择可以兼顾更广阔时空范围; 同时, 专题化可

以与教师的研究特长更加紧密结合,也是打破以西方为中心的建筑史方法探索。也许中国古代城市空间和建筑犹如重写本(palimpsest),原有的痕迹不断被刮去,新的环境不断往上覆盖,也许那些在历史进程中丢失的空间关系和文化叙事已很难在已有的建筑或者建筑绘图中被发现,但是中国的建筑史研究和教学有其自身的使命、再现媒介和解读方式。正如西方的拼贴创作,看似只表达纯粹的空间和结构关系,实则通过绘图解构并重组了历史,进而指向隐藏的社会的或政治的关系,我国古代的建筑图像则叠加多个时空的想象投射,重构被物质空间所覆盖的消失的时间意义。因此,以专题的方式组织教学内容,以跨文化的研究带动对图像和话语媒介的选取,可以进一步拓展世界建筑史研究和教学的第一手资料范畴。

刘先觉教授很早已经提出“就地考察”的建筑史教学方法,但是在实际课程组织中很少有成功执行的案例。^{[18][19]}课程安排的限制或许是导致“就地考察”难以融入我国建筑史教学的原因之一。无论是巴特莱特学院还是密西根大学,建筑史教学的课程安排至少是一周两次课,除了讲座之外,每周至少一次研讨课或者步行研讨课。而我国的建筑史教学往往只安排一周一次的讲座,意味着“就地考察”必须占用讲座时间,缺乏灵活性。同时,巴特莱特的建筑史步行研讨课中,每次体验某一种空间类型的演进,通常与每一位带领教师的研究相关。换言之,步行研讨课的内容不完全与讲座内容一致,可以视为对讲座专题的辅助或者新专题的补充。对于我国的世界建筑史教学而言,可以考虑将客座讲座与“就地考察”结合,尽量与客座嘉宾的研究结合,以增加丰富度的同时,保持教学的深度。

对我国而言,建筑行业和教育在房地产经济的加持下经过二十多年的高速发展,而如今又进入存量发展时代,建筑史课程的教学方法早已不是20世纪末那般简单一致和区分明确。^[15]在新世纪初,《建筑史学家学报》(JSAH)的一批文章试图

较为全面地勾勒世界范围内建筑史教学状态。但是,其重点明显还是在西方国家及其殖民地的建筑历史教学的发展历程,对中国、日本、拉美、北非等国家的建筑史教学描述和讨论稍显刻板 and 简单。我国的建筑教育虽受“布扎”教学法的影响而将建筑史教学置于设计教学的附属地位,但我国世界建筑史教学的目的是否依然以服务于建筑设计和实践为目的?巴特莱特学院将设计工作坊体验式教学的方法融入历史教学的模式为达到这一目的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但是,就当下我国建筑学专业所面临的困境而言,建筑史与建筑设计的关系,或者建筑史的学科边界,值得重新思考。尤其是对于综合性大学而言,世界建筑史教学的对象也许不仅是建筑专业的学生或未来从事建筑设计的学生,而是更广阔的学生受众。从新的对象的需求来构想,是否能帮助我们重新定义世界建筑史教学的性质和意义?

与此同时,建筑学学科的边界正在外延,从建造规模、用户类型到材料形式,新的建筑类型早已超出历史建筑的参考和语汇。在新的学科语境中,建筑史教学是为了帮助学生认知和理解过去的建筑本身,抑或是为了抓住人类记忆中那些在关键时刻闪现的建筑痕迹及其更广泛的影响?如果说以往建筑史教学中的再现目的更多是为了指向建筑设计的重要概念和经典案例,那么当建筑学越来越接近通识教育的今天,建筑史教学中的再现(图像再现或情境再现)是否也应该指向更为广泛的“关系”,以训练思维方式为目的(包括关联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所谓关联性思维,可以是思考建成环境与人类文明中的关键历史事件的关联,过去与人类生存环境的当下和未来的关联,建筑史与更广泛的人文艺术学科的关联,以及建筑史与建筑学理论的关联。所谓批判性思维,可以是反思特殊的话语、图像、环境生产如何“建构”了不同文化理解下的历史及其“丰富性”。从新的教学目的出发,能否帮助我们在学科交叉的趋势中整合建筑史以及与其最接近的跨学科资源?

从世界建筑史教学中“再现”的方式和目的变化切入,本文回顾了建筑史教学法在成型和发展过程中的挣扎和自我革新。从建筑史教学法的转向,我们或许能察觉当代建筑史研究范式和话语的转变。目前,西方史学的话语也在转向,建筑史教学对图像的应用和解读呈现出向人文学科领域靠近的趋势;在批判性理论主导下,绘图和图像的研究目的已不再直接指向设计思维,甚至建筑世界作为表达内容已不是重点。数字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是历史的生产者、叙述者和传播者;真正的危机在于,我们误认为这些媒介传达的信息是客观不变的历史真相。在信息资料甚至环境体验都随处可见的当下,建筑史教学的使命是否还是学习历史上的重要建筑的史实?抑或是带着质疑叩问建成环境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作用和责任?

[致谢: 本文的写作过程中获得了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巴特莱特建筑学院伊娃·布兰斯科姆(Eva Branscome)教授、美国密西根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安德鲁·赫舍尔(Andrew Herscher)教授和克莱尔·齐默尔曼(Claire Zimmerman)教授的慷慨支持,接受作者的深度采访并不吝提供教学课件作为本文的研究素材。]

注释

- ① 启蒙运动时期的建筑理论家马克-安托万·洛吉耶(Marc-Antoine Laugier, 1713—1769)。
- ② 参见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JSAH, 第58、61、62期。
- ③ 英文原文为“Is history germane to architectural production, or education? Or not? Is history an autonomous discipline or a ‘service’? If the former, is it nonetheless valuable as a source of critical insights into the position of architecture in society? If the latter, is it a trove of available forms, an array of formal paradigms awaiting transformation, a breeding and testing ground for architectural hypotheses, or ...” 参见 Anderson, “Architectural History in Schools of Architecture,” 283页。
- ④ 美国的第一所建筑学院是MIT的五大学院之一,其他四个学院包括土木工程、机械工程、采矿和地质学、化学学院,参见 Anderson, 282页。
- ⑤ 除了赖特和密斯,19世纪的法国建筑师勒·迪克(Viollet-le-Duc)和美国建筑师沙利文(Louis Sullivan),他们草图也呈现出明显的对历史建筑场景和元素的再想象,只不过用的是新的材料、技术和

结构特征来实现逼真 (verisimilitude) 的场景。参见 Levine, *Modern Architecture: Representation and Reality*, 10-11 页。

⑥ 密斯的拼贴图项目 *Concert Hall project* 和 *Museum for a Small City project*, *Modern Architecture: Representation and Reality*, 参见 Levine, 230-235 页。

⑦ 在《空间·时间·建筑：一个新传统的成长》中，吉迪恩通过将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和高尔夫球手击球的照片比较，展现共同存在的“时空”世界观。诺伯格·舒尔茨在《建筑意图》(*Intentions in Architecture*, 1965 年) 中，则通过不同时期建筑的比较，展示了立方体作为建筑的来源。参见 Giedion, *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 The Growth of a New Tradition*, 754-755 页和 Norberg-Schulz, *Intentions in Architecture*, 456-468 页。

⑧ 《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 1966 年) 通过对大量的历史建筑 (包括现代建筑) 的分析，提出建筑一直以来对象征性的元素的依赖，而非纯粹的形式、结构和内容的表达。面对战后美国的大都市尺度下的建成环境，文丘里等在《向拉斯维加斯学习：建筑形式领域中被遗忘的象征主义》(*Learning from Las Vegas: The Forgotten Symbolism of Architectural Form*, 1977 年) 中，通过将强形式的英雄主义建筑与装饰棚式 (decorated shed) 的平凡建筑进行对比，论证“平凡的装饰棚” (包括公民建筑、商业建筑、住宅建筑等) 才能更有效传达日常城市环境的文化本质。

⑨ 英文原文为 “As architectural history (and by that term, I include ‘theory’) is being measured more and more by the scholarly protocols of the humanities, it becomes ever more remote from the concerns of architectural practice.” 参见 Jarzombek, “Dislocations of Disciplinary (Architectural) History”, 489 页。

⑩ 英文原文为 “In the 1970s, architecture’s investment in everyday urban landscape, through projects like *Learning from Las Vegas*, were investments in the form of that landscape. As such, these investments tacitly affirmed that landscape’s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dimensions, which rendered those dimensions immune from architectural critique or negotiation.”

⑪ 照片由迈克尔·布伦南 (Michael Brennan) 拍摄于 1999 年，唐纳德·特朗普在其纽约第五大道特朗普大厦的办公室中，盖蒂图片社 (Getty Images) 收藏，<https://www.gettyimages.ca/detail/news-photo/american-businessman-donald-trump-in-his-office-in-trump-news-photo/144711515>。

⑫ 阿尔伯特·康 (Albert Kahn, 1869—1942) 是 20 世纪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工业建筑师，以创新的工业结构而负有盛名，影响了后来的现代主义建筑师们。他在密歇根州底特律附近包揽了各种类型的项目，从校园建筑 (包括密西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数个建筑)、医院建筑、住宅到最具影响力的汽车、飞机甚至武器生产工厂。

参考文献

[1] Anderson S. Architectural History in Schools of Architecture[J].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1999, 58 (3) : 282-290.

[2] Howard, D. Teaching Architectural History in Great Britain and Australia: Local Conditions and Global Perspectives [J].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2002, 61(3): 346-354.

[3] Bergdoll, B. Teaching Architectural History in France: A Shifting Institutional Landscape[J].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2002, 61 (4) : 509-518.

[4] Torre, S. Teaching Architectural History in Latin America: The Elusive Unifying Architectural Discourse[J].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2002, 61 (4) : 549-558.

[5] 顾大庆. 中国的“布扎”建筑教育之历史沿革——移植、本土化和抵抗 [J]. *建筑师*, 2007 (2) : 97-107.

[6] Levine N. *Modern Architecture: Representation and Reality*[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Press, 2012.

[7] Giedion S. *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 The Growth of a New Tradition*[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8] Norberg-Schulz C. *Intentions in Architecture*[M]. MIT Press, 1965.

[9] Norberg-Schulz C. *Genius Loci: Towards a Phenomenology of Architecture*[M]. Rizzoli, 1980.

[10] Otero-Pailos J. Photo[Histori]Graphy[J].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2007, 66 (2) : 220-241.

[11] Jarzombek M. Dislocations of Disciplinary (Architectural) History[J].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1999, 58 (3) : 488-493.

[12] Forty A. *Words and Buildings: A Vocabulary of Modern Architecture*[M]. Thames & Hudson, 2000.

[13] Forty A. *Concrete and Culture: A Material History*[M]. Reaktion Books, 2012.

[14] Branscome E. The Press Photography of “Red Vienna,” 1929-1938[M]//Cairns G (ed). *Architecture, Media, Populism...and Violence: Reific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II*. Routledge, 2023: 133-160.

[15] Venturi R. *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M]. Museum of Modern Art, 2002.

[16] Venturi R. et al. *Learning from Las Vegas: The Forgotten Symbolism of Architectural Form*[M]. MIT Press, 1977.

[17] Koolhaas R. *Delirious New York: A Retroactive Manifesto for Manhattan*[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18] 刘先觉. 外国建筑史教学之道——跨文化教学与研究的思考 [J]. *南方建筑*, 2008 (1) : 28-29.

[19] 刘先觉. 再论外国建筑史教学之道——教研结合, 史论并重, 开拓外建史教学新视野 [J]. *建筑与文化*, 2009 (11) : 66-71.

图片来源

图 1: Norbrg-Schulz, *Genius Loci*, 1980.

图 2 ~ 图 5: Eva Branscome, “The Arrival of Modernism and the Urban Village”, 2023 年

图 6: 作者基于 Google Map 自绘

图 7 ~ 图 10: Andrew Herscher, “Unhousing: The Architecture of Total War”, 2019 年